

2102

文
史
资
料
研
究
委
员
会
编

綦江文史资料

第十辑

909



綦江县文史资料

第十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綦江县委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资料 仅供参考

一九九〇年八月



綦江县文史资料
(第十辑)

政协四川省綦江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四川省綦江县政协 邮电编码631420)

印刷 綦江县印刷厂

封面题字 池永成
责任编辑 徐大沛
篆 刻 赵平安

目 录

政 治

- 战于团綦江惨案 胡渊如 曹步一(1)
别东海之滨 入天府之国 王知涵(20)
綦江的解放和接管 曹步一(23)
一九五〇年綦江匪乱始末 梁仲恒(32)
天台山歼灭朱化南、刘中周股匪的情况回忆 高镇如(51)
我在綦水地区经历剿匪的回忆 杨子超(59)

军 事

- 石达开转战綦江 蔡克勋(73)
民国时期綦江的驻军 陈秉中(82)
红军长征过石壕 徐大沛整理(94)
我所知道的国民党四十四军 陈光泽(99)

经 济

- 民国时期綦江的屠宰税和田赋 陶登祥(101)
八十年古南镇工业一瞥 韩宗愈(107)
民国时期綦江的民间运输业 邹策勋(116)
四川第一条铁路——綦江铁路 王光荣(134)

教育卫生

- 四十年代綦江的教育透视 桂守成 (146)
濒临倒闭的县卫生院恢复了活力 申屠云口述
梅广智整理 (151)

社 会

- 綦江旅渝同乡会 周 培 (154)

人 物

- 记祖父张华庭从政事略 张集新 (160)
民国末期綦江县长——胡大斌 吴鹏飞 (167)

战干团綦江惨案

胡渊如 曹步一

战干团在綦江制造的惨案，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以“共党”、“汉奸”之罪名，屠杀爱国青年二百六十多名，刑残四十多名为震惊中外的大惨案。案发以后，章士钊先生曾愤笔写出“自古奇冤多，大者綦江狱”的诗篇。有的知情者也曾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和其他刊物上揭发过惨案的内幕。但由于时间较久，所揭发的事实多属回忆，在某些时间、人物等方面难免小有出入。现根据重庆市档案局主办的《档案史料与研究》上所载的原始资料及新征集的有关史料综合整理此文，供史家研究。

一、战干团成立及一团转来綦江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下，全国各阶层人士同仇敌忾，一致主张团结抗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生怕爱国青年去延安抗大，增强共产党的力量，乃以“抗日救国”为名，于1938年春建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藉以收买青年知识分子，诱骗青年学生入团进行法西斯训练，企图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工具。战干团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李宗仁、顾祝同、胡宗南分别兼任副团长。各团由教育长实际负责。战干一团初设武昌，后迁綦江。

江，二团设山西，实际未成立，而由阎锡山另办一个集训团；三团设江西雩都；四团设西安。战干团在各地招生进行短期训练后分配到军政各界做政工工作。

战干一团于1938年1月在武昌珞珈山武汉大学成立，桂永清（江西贵溪人，留学德国，原南京教导总队长，中将，特务组织“力行社”组织者）任教育长，孙伯睿、滕杰（均“力行社”组织者）先后任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伍天伟先后任总教官。团部下设办公厅和五个处，查奉璋任秘书室秘书，秦惜华任人事科科长，伍宗藩任统计调查科科长，第一处（管组织训练）处长王章，第二处（管总务）处长朱剑侯，第三处（管财务）处长王汉英，第四处（管医务）处长张文哲，第五处（管毕业分配与联络）处长张富岁。

战干团一团每办一期训练，即按当时受训人数多少，编一至二个总队，下设大队，中队、分队，一个总队有两千多人。第一期为第一总队，驻武昌左旗，于1938年4月1日开学，总队长杨厚彩（湖南浏阳人，中央军校六期学生，留学德国，“力行社”成员）。第二期为第二总队，驻武昌右旗，总队长钟宝胜。同时还设有一个学员总队和女生大队。第一、二期的学生，主要是招收沦陷区的知识青年。学员总队主要是训练各部队保送的下级军官。第一、二期的学生和学员总队、女生大队均于1938年8月1日在武昌同时毕业。第三期在武汉招生，为第三总队，总队长先后为刘子淑、萧劲（湖南湘潭人，中央军校六期学生，留学德国，“力行社”成员），总队附王道，总队指导员邱岳。是年秋，武昌沦陷前夕，第三总队迁湖南桃源县泥窝潭，于1939年3月毕业。第四期于1938年夏在武汉招生，10月到达湖南辰溪县的

浦市，1939年1月开学。因第四期学生多，编为第四、第五两个总队，分别驻辰溪、沅陵。第四总队长钟宝胜，总队指导员吴文春。第五总队长杨厚彩，总队指导员杨周熙。后因日寇侵入湖南，战干一团又奉令转移，沿川湘公路于1939年6月到达綦江。

战干一团迁綦江后，团部初设县城文庙（今县委所在地），后迁綦河对岸湾滩子（今綦江园艺场）。教育长桂永清驻县城南郊枣子园。政治部驻沱湾上升街。团部直属特务连驻湾滩子，通讯连驻沱湾禹王庙。第四总队驻石角镇。第五总队驻江津广兴场。两总队的学生，均于1939年9月15日在綦江农场（今綦江中学校）同时举行毕业典礼，蒋介石亲自到会讲了话。

在第四期学生毕业前，战一团萧劲（原第三总队长）、杨厚彩（原第一总队长）等人到湖南长沙、江西南昌、广东梅县和韶关、云南昆明、四川重庆、万县、泸州等地招收两批学生，共二千七百多人。第一批为第五期，沿用第三总队番号，总队部驻江津五福场（今五岔乡），一千四百多学生，分散在五福、贾嗣受训，于1939年冬开学。总队长萧劲，副总队长何良信，总队附陈焜，总队指导员郑涛。下属三个大队，大队长为杨天威、张少泉、曾传庆，指导员有谢泌等人。第二批为第六期，沿用第一总队番号，总队部驻江津广兴场，一千三百多名学生，分散在江津的广兴和綦江的升平等地训练，于1940年4月1日开学。总队长杨厚彩，总队附索本勤，总队指导员杨周熙。下属三个大队，大队长为金干之、吴周英、傅桓武、钟显尧，大队附有吴文义、杨泉祥等人。

二、惨案起因及普遍清查

1940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日本为了尽快结束侵华战争，以便配合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因而在进攻解放区的同时，又加紧对蒋介石进行诱降活动。于是，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一方面继续扩大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事摩擦，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内加紧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抗日民主运动。战干团綦江惨案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战干一团第三期在湖南桃源县时就由一些进步学生发起组织了一个剧团，当时深得桂永清赏识，特派总队附王道具体领导。在转移綦江途中，剧团沿途宣传抗日，颇受群众欢迎。抵綦江后，桂永清决定正式建立为“忠诚剧团”，并指派熊寿农任总干事，单文健任指导员。该剧团初驻县城瀛山宾馆，后驻北街火神庙（今解放路小学校址），演出剧场在文庙。经桂永清批准，剧团排演了阳翰笙编的话剧《李秀成之死》。起初，桂永清很欣赏这幕剧（据说他当时曾狂妄地以李秀成自命，认为抗日初期他率领教导总队守南京时没能发挥自己的力量，处境恰与李秀成相似）。1940年1月15日，忠诚剧团赴重庆上演这幕剧。当时青年学生抗日热情很高，为了演好这个剧，特请著名戏剧家马彦祥担任导演，并常和重庆市文化界人士往来，这就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极大不满。桂永清派驻团内的特务向桂密报说，此剧是宣传共产主义，并说剧团内有共产党组织。桂永清得报后大怒，立即转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陈诚。在陈诚的同意下，桂永清以国民党秘密颁布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

为依据，令忠诚剧团立即返回綦江，以宣传共产主义，有共产党组织为罪名，将剧团的职员和男女演员五十多人，分别扣押在枣子园，湾滩子、广兴场等地，由政治部主任滕杰、总队长杨厚彩、萧劲负责审讯。

4月下旬，桂永清拨发特务经费六千多元，令滕杰、萧劲等人在全团学生中普遍清查共产党人。开初，是驻五福场第三总队学生李奇麟开小差后，总队部将平日与李最友好的舒汉仪扣押审讯。在酷刑之下，舒汉仪被迫承认自己和李都是共产党，并供出驻广兴场一总队学生邓翰臣为同党。三总队队长萧劲把邓翰臣是共产党的情况密函一总队长杨厚彩后，一总队即将邓翰臣扣押严讯。三总队有个学生罗长雍听说邓是共党要犯，因过去曾与已开小差的逃生朱德鸿有仇，乃借到綦江为队部采购大米的机会，于5月8日以朱的名义伪造一封信，托一总队传令班长赵中豫转交邓翰臣，信中嘱邓“召集第二次吾党会议”，以“共党”罪名陷害朱德鸿。此时，邓翰臣正被刑讯关押中，赵中豫便将此信交总队部。于是朱德鸿被捕，在刑讯之下招认自己是共产党，同时又供出许多“同党”，包括罗长雍在内，以此逐一牵连，遂涉及一、三总队数百名学生。

战干一团在普遍查“共党”案件的过程中，又发生了所谓“汉奸”案。1940年6月初，一总队学生黄英华密报同学丘价在站岗时宣扬汪精卫，故总队以丘有汉奸嫌疑而逮捕审讯。丘受刑不过，供认在战干团有“新民会”汉奸组织，由此逐一严迫，又牵连一大批学生。

三、酷刑逼供

战干一团在清查“共党”、“汉奸”两案中，一连三总队长杨厚彩、萧劲等大佐桂永清、藤原的指使下，使用各种酷刑对无辜学生进行逼供。

在审讯“共党”案件中，伪造朱德鸿致邓翰臣信件而又被供为同党的罗长雍于1940年5月11日被捕。吴文义对其审讯时，问罗何时参加共产党，罗答不出，便先受电刑（据受过电刑的人说，开始感到五脏崩裂，全身皮肉像撕开一样剧痛；电话机摇上两三次就神志不清，形同半死），继又吊在屋梁上用竹棍毒打。13日晚上送大队部审讯，一进屋就被捆吊起来，用竹棍猛抽，罗受刑不过屈认自己是共产党。又问是不是联络员，罗只得答应“是”。为了要罗供出同党，又灌以烈性酒，罗在醉昏昏中又乱供出一些人。20日总队部再审，罗一进门就见总队长萧劲气势凶猛地提着手枪，又将电话机线套在手上准备要用电刑的姿态，厉声喝问：“你哥哥是不是共产党？不承认就枪毙！”罗战战兢兢地只得答应“是”。原朱德鸿所在区队的区队长黄慕麟，本于5月上旬已请准长假赴合江另谋工作，他在队时见朱学诚良好，平时又极守规则，故甚为喜悦，及朱被捕并屈招为共产党后，黄亦因此涉嫌。在审讯朱的同时，中队长吴葆翔回告黄慕麟，说教育长不准长假，促黄归队。黄于6月11日被捆绑归逮捕，连夜审讯。在电刑、酒灌和捆绑吊打下，黄屈认自己是延安抗大毕业生，共产党周韬奋曾派卫士周强率领四十人隐伏森林内准备向总队部、大队部分头进攻。一位广东籍的学生李洪，很会写文章，曾在总队征文比赛中获第一名奖。团部机关刊物《力行月刊》上曾载过他一篇写抗日内容的《大地怒吼了》的文章。桂永清说，此文很象生活书店的笔调，便疑

李是共产党。又因朱德鸿供李为同党，于是被捕刑讯，只得屈招。有个学生荣树风，因受株连于6月2日被捕，遭蒙着眼睛毒打后，被迫编造他参加共产党的组织情况是：股长何鸣，组长曾必庆，指导员魏德良，自任宣传员；同党有林郎山、李继青、彭云建、潭起风、瞿云光。11日，审讯人员说他不是宣传员，而是组长，又被吊起来用扁担毒打。他只好屈供：股长是郑经明，组长是黄昌烈和自己。黄组的组员有胡长安、张贤，指导员吴俊，宣传员邓坦白；本组的组员有李奎治、傅文彬、黄慰祥，指导员唐树南，宣传员傅剑群。审讯人员又问他组织暗杀情况，经刑讯后乱招由自己杀李队长，傅剑群杀大队长。

杨厚彩等人还采取诱骗和刑讯交替使用的手段迫使学生招供。在审讯学生蒲立青时，杨厚彩装着很亲切的样子对他，承认了可以自新，接着，蒲就看见同学燕乘风在孙中山总理遗像前宣誓改过自新。总队长同燕亲切握手后放回队去了。蒲便仿照燕乘风那样在总理遗像面前改过自新，以为总队长同他握手后会把自己放回队；不料另一审讯人员又逼他写出同党名字。审讯人员提出一个名字，他只得写一个名字，共写出了吴听、萧星、周宗孝、徐松等十人后，第二天才放回队去了。过一星期后，蒲又被骗到总部，说他担任联络民众工作未交待，经绑吊、电刑后，蒲又乱说几个老百姓的名字。学生莫干山等人被押到总队受审时，卫兵司令有意准许徐松同他们小声说话。徐松轻声同他们说：“不承认是受不了刑的，共产党组织有区团部、区分部、小组。”还叫他们说共产党曾准备于5月1日暴动。莫干山等怕受刑不过，就照徐松的话供认了。

审讯人员在审讯学生时十分残暴。贾嗣乡赵家岗民房曾驻有战干团一个分队。一天晚上，住户姜尚离的母亲听到隔壁屋里发出惨叫声，便从破竹壁缝偷看，见到屋内点着灯，有人边打边问是不是共产党，有哪些同党，问后又是一顿乱棒，最后还挖掉了被刑讯者的眼睛。其残暴和凄惨的号叫，吓得姜母忙闭上眼睛，再也不敢偷看了。一总队学生吴听、刘翼云三人因常到广兴乡小学义务教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救亡歌曲，被特务密报有共产党嫌疑而遭逮捕。二人因受刑不过，便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说在学生中组织有“读书会”、“学习会”、“研究会”等组织。结果，二人因受刑不过均带镣跳楼自杀。凡被株连屈供的学生都分别关在总队、大队或中队部，戴上刑具，日夜蜷缩在拥挤不堪的室内，任凭蚊虫叮咬，人人伤痕累累，病痛交加，莫不枯瘦如柴，形同骷髅。

株连所及，地方上的老百姓也遭殃。广兴街上店员徐银光、张绍仲，广兴乡农民陈宗兴等人，因给战干团学生转交过信件，亦涉嫌而遭关押，后经乡公所证明才取保释放。屠文光因唐芝信托他去保唐的姐夫雷雨田而遭扣押。雷雨田被吊打一夜死去。代洪德、萧远亮二人路过五福茶馆喝茶也被捕，因受刑不过只好屈招是烧饼铺老板马鸿亮、刘焕章叫他们来打听战干团的情况。綦江瀛山宾馆经理危石顽也因忠诚剧团在该馆住过，战干一团总务处长便勾结宪兵，以战干团的一个官兵在瀛山宾馆失去一笔钱为借口，将危三擒三纵，妄图获得共产党的线索。

战干一团在审讯“汉奸”案中，同样是酷刑逼供。1940年6月2日晚，被黄英华密报有汉奸嫌疑的丘价被捕，前后

受过五次酷刑：第一次几度电讯，直到头昏眼花、四肢麻木始止；第二次灌烈性酒，昏醉招认；第三、四次是电打交加数日不能举步；第五次在旧伤痕的基础上更被打得遍体鳞伤，再用烧红的铁器烫烙下肢，丝丝作响，青烟直冒，刑后动弹不得，抬送关押室，溃烂数月不愈。丘遭酷刑后，乱供汪精卫组织了“新国民党”，自己在上年11月于广东曲江参加了汉奸组织“新民会”；新民会在本团的会长是范王风，副会长是丘价，秘书陈煜坤，总务孔宪总，宣传姚士龙，组织由范王风兼，调查为黄谦元。丘价乱供后范王风当即被捕。范对新民会这一词从未听说过，当然招不出，先被悬梁吊一个多钟头，继又电打交替，竹杠打断后又用麻绳捆缚两脚拇指倒挂屋梁，汗泪长流，痛彻心髓，人几半死，不得不招认自己是本团“新民会”会长，并乱供汉奸组织在曲江、衡阳、常德、重庆等地所设机构，还将自己记忆所及的当地好友供为机关工作人员。范经酷刑后，只求速死，便与同禁学生陈慕识相约乘小便之机跳楼自杀。殊陈慕识先跳楼摔死后，每遇小便时卫兵从后紧握缚绳，故范欲自杀未遂。事后，在审讯中又追交汉奸组织秘密联络的无线电机，范决心以死为快，满口承认自己把电机密藏在山中，并具结如交不出电机，立即枪毙。次日，队部派人把伤痕累累的范王风抬上山去找电机，当然找不出来，又被捆在树上毒打。被丘价乱供的陈煜坤（队部练习队长）于6月21日被捕后，审讯人员问他走错了路是否觉悟，他摸不着头，不知所答，当即被反剪双手，悬梁毒打，继又悬空电刑，昏去多次，只得屈供参加广东“抗日先锋队”的汉奸组织及设在曲江、重庆、綦江等地的汉奸机构和人员。以后在审讯中继续追问汉奸组织

的无线电机，有个学生李浩然乱供交与黄谦元，黄又供交与陈煜坤，陈又推交与李浩然，在严刑之下，推来推去，电机无法交出，陈煜坤乃谎称早已毁弃山中。于是，李、黄、陈三人多次被押上山寻找，找不着就绑在树上毒打；结果黄谦元棒下身亡。陈煜坤为避免皮肉之苦，忽一日早餐时路过总队部，见床上有一旧表，乃急藏怀中，晚上暗取少许零件，其余弃入厕所。7月15日又押上山寻找电机时，陈便将拆取的旧表零件密藏衣袋内，在山上拨草乱寻。盛夏炎天，他俟监押人不注意时，借擦汗水机会取出一点表件，谎称在草中觅得一“机件”上缴。寻找一天，如此上缴三次，最后将表轮缴上就再也找不到“机件”了。次日，总队附说，所缴机件太少，命再去找，并命九大队的学生十余人前往协同寻找，却一无所得。追查电机一事暂告停止。

在严刑逼讯“汉奸”过程中，徐植修供认他参加汪精卫组织的“铁血队”，靳宏斌供称“新民会”总负责人是施子周（当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李学忠供谓“青年救国团”昆明总负责人李兰亭，龙飞供认自己是南京汪精卫系统派来搞情报工作的，路过贾嗣在茶馆喝茶而遭逮捕的老百姓康荣书供说住江津的“汉奸”有蒋立生，另有四十六名（这仅是已发现的资料，实际不止此数）学生也招供他们参加了汉奸组织。上述招供者，无一不是在绳捆、吊梁、电烧、铁烙、棒打、鞭笞等酷刑逼供下胡编乱造的。而那些审讯者却据此上报邀功，对“案犯”则大肆屠杀。

四、血腥屠杀

桂永清以共产党罪名扣押忠诚剧团进行审讯，是向陈诚

报告，并得到陈的同意后才干的。在审理忠诚剧团的“共党”案件中，1940年4月1日，陈诚突然来到广兴场主持第六期的开学典礼；同时检阅即将训练结束的驻五福场、贾嗣桥第五期学生的阅兵式。4月下旬，忠诚剧团扮演李秀成的演员李英就被活埋在枣子园附近，剧团美术组长胡恩涛等二十二人同时被杀害。广兴、五福、贾嗣等地亦发生了秘密大屠杀事件。

为了借口屠杀爱国青年，滕杰、萧劲、杨厚彩等人在清查“共党”期间，他们还制造两次所谓“共产党暴动”的恐怖活动。第一次是1940年春末，他们暗地印发传单、标语，内容有“打倒土豪周培根”、“活埋乡长幸攀桂”、“打倒军阀周化成”等，公开捏造“共产党密谋暴动”。随即在广兴场四周修筑作战工事，俨然如临大敌，使不明真像的团内学生和周围群众胆战心惊。第二次是同年6月上旬，萧劲在五福、贾嗣地区搞了一次宛如两军夜战大量放枪的所谓“共产党暴动”事件，搅得方圆二十里的百姓彻夜不安，饱受惊吓。次日还煞有介事地组织三总队学生对住地周围挨家挨户地搜查所谓暴动失败后潜伏下来的共产党人，搞得当地老百姓人心惶惶，恐怖万分。

三总队屠杀青年学生的手段极其残忍。据当时在三总队一大队部警卫排担任警卫并直接参与杀害学生的蒋志逸说：“关押在大队部九十多个学生，都是警卫排在深夜里分批杀掉的。大队长张少泉指示尽量少开枪，以免惊动老百姓。因此，行刑时都是先挖好大坑，用刺刀戳死后推到坑里埋掉。”三总队有一个学生杨霞村经多次刑讯屈供为共产党员后，一天下午，由两个武装卫兵押着他拖着遍体伤痕的身躯